

飞天

90年典藏
散文随笔卷
上

主编 马青山

甘肃文化出版社

资料性
可读性
珍藏性

飞天

60年典藏
散文随笔卷
上

主编 马青山
副主编 阎强国

一九五六年 第 8 本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天》60 年典藏.散文随笔卷上 / 马青山主编.-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490-0118-7

I. ①飞… II. ①马…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③随笔 - 作品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2186 号

《飞天》60 年典藏 散文随笔卷 上

马青山 主 编

阎强国 副主编

责任编辑: 郇军涛

责任校对: 王 君 子 矜

装帧设计: 陈 青

出 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曹家巷 1 号

邮 编: 730030

营 销: 甘肃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0931) 8454870

排 版: 甘肃海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刷: 甘肃海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兰州市九州大道 251 号

邮 编: 730046

开 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15 千

印 张: 23.7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90-0118-7

定 价: 420.00 元 (全九卷)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真情告白

马青山

《飞天》是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第一家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也是迄今甘肃唯一的一家省级文学刊物。它的前身由远及近，为《甘肃文学》《甘肃文艺》《陇花》《红旗手》《甘肃文艺》，1981年更名为《飞天》至今。现已刊行574期。

在《飞天》创刊6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一套包括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我与文学、戏剧影视及《飞天》纪事在内的“60年典藏”，是文联当家人和我们新老《飞天》人共同的心愿。选本从创意策划到具体选编，有赖马少青、孙周秦等领导和杨文林、李云鹏、何来、陈德宏、老乡等老同志的智力支持和亲自参与。他们对刊物深厚的感情和始终如一的关爱，令人深深感念！

在翻检历年刊物的过程中，我认定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即刊物和作者一同成长，一同进步；《飞天》的发展与甘肃文学的发展始终并行；刊物兴则文学兴，刊物衰则文学低迷，反之亦然。自1950年8月创刊至“文革”结束的近30年，时办时停，刊期、开本和页码亦不固定，栏目编排及装帧印刷都比较粗陋。其间，政治环境时好时坏，所发作品包括名家之作，大都带有特定的时代印记。频繁变更的刊名，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到了新时期，刊物才经由平稳过渡，进入自由发展期。我们在选编

作品时,考量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甄别遴选,多有兼顾,对彼时产生较大影响、艺术上亦有可取之处而现在看来确有图解政策之嫌的部分作品也予以入选,以便存史。

文学刊物的核心是“出人才出作品走正路”。长期以来,《飞天》以此为出发点和矢志不渝的追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推出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作品,扶持了众多的文艺人才。因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定位,刊物也便既是陇军演练的平台,又不唯是本土作者的自留田;还因为“不薄名人爱新人”的办刊理念,《飞天》时有名家亮相,更不乏年轻鲜活的面孔。刊物和作者互为红花和绿叶。许多作者起步阶段以能在《飞天》发稿为荣,他们借助这个平台成名后,反过来又以其力作支撑着刊物的发展,为刊物增色添彩。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阶段性地,《飞天》总有一个相对稳定、颇具创作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作者群,那是我们尤为珍重的财富。

《飞天》的诗歌一直是强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新边塞诗”的兴起和大学生诗歌的滥觞都与本刊的倡导和不遗余力的推介有关。近年来,甘肃诗歌的声誉和对外影响日隆。这源于李季、闻捷等前辈诗人的引领,源于甘肃诗坛早期拓荒者和后来人代代相延的正道传承。《飞天》给予诗歌的版面一直算得上固定和慷慨。这套选本特以洋洋三卷的容量彰显其庞大的阵容。即便这样,仍有许多的佳作难免被割爱。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作者的文学创作明显呈现从清浅纯正到浑厚多元的审美趋势。在作者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在稳步上升。我们从中得到丰富而又独异的精神滋养;这其中也包含着省外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的赤诚奉献。

已历60龄的《飞天》,始终和读者保持着一种心神相通的关系,把读者的欣赏口味作为办刊的晴雨表,做到了眼里有读者。值此甲子之庆,我们力图优中选优,让这套“典藏”能够贴近读者的心。如果你发现内中作品与你期待的美文佳构尚有一定的距离时,我们也有同样的遗憾。虽然舞剧《丝路花雨》、话剧《西安事变》、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文学脚本的刊发为本刊赢得过一些声誉;虽然近年来小说的势头渐劲,转载率和关注度不低,但堪称大气、经典的作品并不多见,入围国家大奖和权威排行榜的作品似与我们无缘。这是我们时刻不敢怠惰的自醒!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飞天》的成长进步,甘肃文学的发展繁荣,除了作家和编辑的共同努力,除了读者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自然也离不开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离不开领导的真切关怀。如我所言不谬

的话,郭沫若、茅盾、周扬三位大家共同为创刊号题词的省级文学刊物仅此一家;首发朱德、叶剑英大型组诗的省级刊物大概也不多见;至于曾在兰州军区任职的肖华将军,对刊物则不唯作品方面的支持。1990年,省委书记李子奇、副书记卢克俭双双出席《飞天》创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2000年,省委书记孙英在陪同以黄菊为首的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参观的间隙,来到《飞天》创刊50周年座谈会上,即席发表了长达40分钟热情洋溢的讲话,李重庵副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讲话;他们对《飞天》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2005年,在《飞天》创刊55周年、刊行500期之际,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浩,省政协主席陈学亨,省委副书记马西林,副省长李膺等领导题词祝贺。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特别是省文联的领导,对《飞天》的编辑出版和相关活动给予了始终如一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因此才有刊物的健康稳步发展,才能取得眼前的成绩,《飞天》才能飞到目前的高度。——2008年,《飞天》首次进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9年,《飞天》由月刊变更为半月刊,并获得第二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奖;2010年,《飞天》进入甘肃“农家书屋”工程。

当然,遗憾也是存在的。有些人处其位而与文学总觉生涩隔膜。就让他们无缘地擦身而过吧。

《飞天》是一个小小的团队,个中年轻人居多,赶上甲子之庆应是一种机缘,这种幸运实属难得。在“60年典藏”定稿付梓之际,我谨代表这个团队的12名成员,向多年来关心支持本刊的读者、作者、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向历届编辑、各级领导和朋友们真诚地说声谢谢!

言不尽意,权当真情告白吧。

2010年8月

目 录

真情告白	马青山	001
敦煌十年	常书鸿	001
风雨同舟人人心	李秀峰	011
女将行	李 季	017
星 钟	王兰玲	021
新长征中的怀念	宋 平	025
贺老总和我们一起	莫 耶	033
我和萧军的姻缘	王德芬	040
兰州漫忆	伍修权	067
果腹漫忆	杨闻宇	073
记戴望舒同志二三事	程代熙	077
腊月里的唢呐声	黄富强	081
闲话搬家	贺抒玉	088
白月亮	(回族)海 飞	093

边山雪	李志君	097
口 哨	李宝生	102
醇香的思念	姜 安	105
忆莫耶	曲子贞	112
就见三毛	王剑冰	116
童 心	关维晓	119
1989.9.21 在布加勒斯特	唐 栋	126
记雨游香山	张素菱	132
山中岁月	李佩芝	137
猴年说猫	阎 纲	141
我的父亲	刘晓庆	145
我的启蒙先生	何西来	148
我家有个小弟弟	韩小蕙	155
谈 吃	邵燕祥	161
访东坡书院	丹 晨	164
行 者	周 涛	167
蹇作跛驴说命运	昌 耀	169
文化随笔二则	韩子勇	171
昨夜惊魂	公 刘	175
神游三题	叶延滨	181
权威不肯掺水	肖重声	186
牧马人的疑惑	安可君	190
清静庵	朱光亚	192
寻觅优秀的女人	毕淑敏	198
散文二题	海 男	201
柔弱与柔韧	张抗抗	204

父母桥	东 西	206
沉重的回忆	蔡秀文	208
贞节带与斗兽场	陈忠实	212
城之舞	高红十	216
人间走笔	孙见喜	218
伐木者的回忆	万家斌	224
钟爱画家	骆 文	228
童年记忆	范小青	231
曾经那样看电影	吴善珍	234
三界地	第广龙	236
童年的老屋	张艳玲	239
陇头水泊	杨文林	243
大悲谿	毛志成	249
寻找宁静	龙迪勇	255
桥鬼·门神	(台湾)陈大为	259
树 姿	何素平	262
苍狼大地	(裕固族)铁穆尔	265
一个人和羊	王 族	274
遥远的小巷	(回族)吴季康	277
剑客冢	西岭雪	282
这里,铭刻着诗人的名字	张贤华	286
十年一觉异乡梦	柯 英	289
夜读司马迁	易水寒	293
抚摸月光	廖华歌	297
东京笔记	陈喜儒	301
故乡天下灾荒	马步升	310

饮食篇	张爱华	317
寻找星光	王妍丁	321
散文三题	韩作荣	323
河西的月光	杨献平	326
回老家(外一题)	雪 潇	331
无法无天(外一题)	邵燕祥	335
比南方更南	聂作平	338
风中摇摆的村庄	刘士超	348
李贺诗马	王 君	352
大柳树	赵 殷	355
帐篷底下的家(外一题)	栗 子	359
难忘的岁月	清 波	363
还是信任你	裘山山	366

敦煌十年

常书鸿

散文随笔卷
上

001

—

1945年12月，一个北风紧吹的初冬傍晚时刻，暮色已笼罩了到处是断垣残壁的塞外古城。因为寒冷和风沙，南关十字的店面都已提前歇闭了。在街道上，只有隐隐约约从窗纸里透露出来的灯火，和人们煨炕时冒出来的难闻的马粪烟气，才使我们从寂寞冷落的敦煌街道中感到一线生机。烟气随着我们的马蹄声，随着卷土扬沙的西北风，消失在暮色苍茫的黄昏中。

这是三年来，又一次在风沙中夜归千佛洞。三年来，由于重庆伪教育部不能把经费按时寄来，我们要经常向城市商号中挂账，赊购粮食和蔬菜。为了继续生活下去，我不得不亲自进一回城。从天没有亮就骑马进城，东奔西跑，买粮买菜，招雇工人，一直弄到夜色苍茫时才匆匆赶回来。七八十里的黑路，在这荒凉寂寞的戈壁滩上，是最难走的了。我曾不止一次的，在星月全无的黑夜里迷失方向而误入沙山，我就仿佛感到自己真的已被抛弃在另一个没有人群的孤苦无告的世界里了。

这次，我和十四岁的女儿沙娜，各自骑着一匹驮着食物的瘦马，出了敦煌

南门，在已经昏黑的夜色中前进。迎面而来的风沙，像尖针一样刺痛着显露在外面的脸和手，沙娜的头脸整个包在头巾里，只露两只眼睛。当然，我们很想快一点回去，可是瘦马的负荷已超过了它可能的限度，走一步，停一停，好像留恋城市怕到沙漠去似的。于是我们就使劲地鞭打，马蹶了一下，接着就是有节奏地开始奔跑，摇摇摆摆，像骑骆驼似的，但不多久又照样缓慢起来，甚至停滞不前。离城愈远，村落愈见冷落，扑面而来的风沙，就愈益放肆。一路上我们没碰到一个行人。在风沙中，我们来到了戈壁滩的最后一个庄园。再向南行就是汉唐时代的庄落的废墟——佛爷庙。越来越厉害的寒气，一阵阵夹杂在风沙中，刺入肌骨。这时东面出现了一线鱼白色的微光，那是12月20日的月亮，正在钻出重重包围的云层，冲出迷漫的风沙，向高空运行。月光照在阳关道上，可以清楚地看见骡马和骆驼的足迹，它给我们指示出在暗夜中前进的方向。

三小时过去了，还有二十几里深入戈壁沙漠的艰难的道路。这时我们鞭策着前进的两匹马，已困乏得没有一点力气了。袭人的寒风，在无际的戈壁滩上逞威。矗立在西边的鸣沙山，像一条巨龙在天边移动。由于我们在戈壁滩上迷了路，走了一夜，都没有找到出路，把我弄得头晕眼花。一直到天明，才知道我们已被沙山团团围住，看着它好像要扑过来似的，真叫人有点毛发悚然。

“我怕，爸爸！”沙娜把马打了一鞭子，很快地使她的乘骑靠在我的右首，紧张而寒战地用马鞭指点着前面的黑影。“没有什么！”我一面握住女儿的手，一面向她指的地方仔细看了一眼。在月色中，我终于认清了这是一堆由麻黄枯枝（一种戈壁沙漠上的小灌木）所堆成的小沙丘，孩子也是认出来了。但漫漫的长夜和一望无际的戈壁，仍使她恐惧。“爸爸，还有多少路？弟弟早已睡了吧！”孩子在绝望似地问我。她对幼小的弟弟的爱，使我不能不想起孩子的母亲，一个自私自利、在巴黎资产阶级社会里混了八九年的女子，因为受不了沙漠中艰难的工作和困苦的生活，于八个月前，狠心地抛弃了子女和我，投奔她所幻想的“极乐世界”去了。同时，更使我不能不联想到的是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发来的一纸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命令，它使我们苦战了几年的事业，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落得家破人亡。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给予我很大的鼓舞，但“复员”的狂潮，把我们仅有的几个在沙漠中共患难的朋友席卷而去。然而我依然奔波在这寒气袭人的戈壁滩上，感到无比的寂寞和空虚。近五十年来，千佛洞文物遭到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文武官员的严重破坏，挖墙盗壁的事情不断发生。甚至有些专为临摹壁画而来的知名美术家，也是采取粗暴的态度，用木炭直接描在原壁画的画面上，再用白纸来复印出壁画的彩本。也有一些考古专家，为了抄录题记，不惜把水直接喷洒在题记上以此辨认漫漶不清的字迹。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因此，千佛洞文化宝库被一天天的毁损着。那

时的保护工作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尤其是在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命令下来以后,我们的退却等于保卫工作的放弃。我们决不忍心放弃这神圣的保卫文物的责任,并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坚持工作!

在接近黎明的时候,我们才上了离千佛洞还有十里路的九龙坡。这时大风已经停止,一轮明月照耀在万籁俱寂的戈壁滩上,两匹疲乏了的马的影子横卧在地面上,显得有些瘦长和单薄,然而我们却迎着黎明一步一步在前进着。慢慢地,我已能在依稀的晨光中,看见千佛洞前面矗立在南山上的五个烽燧的废墟;我仿佛看到汉唐时代守卫祖国边疆的英雄的形象,他们像钢铁一样的身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塞外的动静。随后我又仿佛看到烽燧上冒出烟火,从四面八方集拢来的敦煌农民驱逐想盗窃 285 窟文物的美帝走狗瞿荫 (Horace Jayne),这些表现英雄的中国人民抵抗暴力的历史事迹,使我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刻,顽强地站立起来,为保卫祖国的历史文物,为保卫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展开坚决的斗争。

二

1946 年春,我为了争取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继续存在,从敦煌去重庆。那时候发“接收”财的浪潮,还继续在国民党中央闹腾着。当时伪教育部的高级官员们,大部分已当了“接收大员”。而留守在重庆的只是一些轮不着到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去“接收”的“下官”们,他们对我在西北的困苦生活,和一连串不幸的遭遇,表示一定的“同情”,允许把撤消后的敦煌艺术研究所,重属于伪教育部;允许增加经费和人员编制等。但当时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正在忙于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根本不把我们的要求放在心上,因此,伪教育部“下官”们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也很快地失去了作用。

1946 年重庆之行,虽然补充了几个人员,但主要的事业费却还是没有着落,研究工作所必须的参考资料仍无法置备。最令人难过的是千佛洞的保护和修建问题无法解决。除掉上述人为的毁损外,千佛洞的自然毁损也是极其可怕的。修建在酒泉系砾崖削壁上的 480 个石窟,大体集中在南段不到一公里长的崖壁上。这些像蜂窝一样的洞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如上层洞窟与下层洞之间的关系,中层洞窟与上层下层洞窟之间的关系,有的两窟之间只有七八公分的间隔,像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上下层,洞窟之间就非常危险了。试想,我们在一个七八公分厚薄的、没有钢筋混凝土的楼板上行走,其安全的感觉如何?何况这里石窟的崖质,又尽是卵石、砂粒和少许的钙质凝固成的。

千余年来,石窟崩毁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从唐代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君修佛龕碑的铭记上知道,当时有洞窟一千多个,中间经过一千二百四十九年,到1947年就只有427个洞窟,毁减的洞窟达到573个之多。以后的年代中要不是加紧营修,其毁减比例必将大大增加。在我初来的五六年中,即遇到三次崖壁的崩坍,幸而它们发生在没有壁画的北段石窟群中。我们难过的是亲眼看到这种险象,和接二连三的崩溃事故,但没有办法来挽救。因为当时伪教育部批给我们的经费很少,只有办公费而没有事业费。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修建。为了引起有关方面对于敦煌工作的重视,我于1948年分别在南京和上海举行了各时代壁画代表作摹本的展览会。虽然获得了各方的好评,但这时国民党政权正临近垮台的前夜,社会上一片混乱现象,反动政权岌岌可危。当我由上海回到敦煌时,我们研究所的经费已经绝了来源。这时由于物价飞涨,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为了维持生活,研究所的全体美术工作者,都动员起来开始作小幅壁画的临摹,标定价格向偶尔来此参观的游人出卖,作为渡过困难的惟一依靠。

很快地,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混乱情况从兰州流传到敦煌。各式各样的谣言又从敦煌传到千佛洞。听到国民党分子从安西逃到新疆和西藏的消息,也听到反动军队要大肆抢劫的消息,还有少数民族败类想去南山隐藏潜伏,等待时机阴谋暴动。在原驻千佛洞的国民党军队撤回城去的那一天,紧张的气氛使我们不能不有所戒备。经过全体职工的协商,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破坏,我们决定组织全体职工,轮流放哨,并且在130窟上面,布置了射击的枪眼和沙包。在158窟中预藏了水缸和干馍,并把陈列馆中重要的文物作了妥善的隐藏,以打钟为号,大家还作了紧急集合的演习。

三

1949年9月24日,正当敦煌瓜果成熟的时节,人民解放军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古老的敦煌城。敦煌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获得了解放。

就在敦煌城解放的第二天,我们欢欣鼓舞地迎接了第一批到千佛洞来的解放军。他们精神饱满,态度和蔼,因此更增进了我们对胜利进军的人民解放军的敬仰。

接着我们便直接与中共敦煌县委及酒泉地委会取得了联系。而且我们得到了热切的慰问与关怀。成批的粮食和棉衣随即按照全所职工的花名册分

发下来。接着北京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又拍来了慰问电，并要我们安心工作，继续为保护和研究敦煌文物而努力。七八年来，在戈壁滩上受尽艰苦，默默无闻地工作，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革命获得胜利的今天，才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没有被人们忘记，才第一次受到了如此亲切的关怀。

1950年9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来了两位领导同志，并带给我们大批慰问品，其中有收音机、各种实用品和小孩的衣物等。面对着亲人，真不觉要掉下泪来。随后我们毫无顾虑毫无隔阂地一连开了七八天接交的会议，总结了八年来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和经费预算及工资待遇等。从此我们就直接受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了。

开过了会，我就应西北军委会文化部的邀请，参加了西北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又接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通知，即刻去北京接受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从速准备1951年春天在北京举办一个包括文物及壁画摹本等在内全面性的敦煌文物展览会。

筹备工作在文化部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下，在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专家们的协助下，经过三个月的积极筹备，于1951年3月准备完毕。开幕之前的某一天，我在展览会场中光荣幸福地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检阅，并得到他亲切的指示和鼓励。当时会场上只有三四个人，两小时的时间一忽儿过去了！临别前我幸福地看到总理如何把我的名字记在他的笔记本中。这是我一生中永远忘不了的两小时，至今虽已经过了八九年，但周总理和蔼可亲的面容和他的感召力，时时刻刻给予我对革命事业勇往直前的积极力量。

第一次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上举行的敦煌文物展览会，是1951年4月初在全国六亿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幕的。展览会内容分壁画和彩塑摹本，经卷文书，绢画以及有关的摄影等几个部分。共计展品1120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是过去任何时候没有的。开幕之日由中央文化部领导同志亲自作了引导介绍，外交部还特别规定了一个日子招待外国使节和国际友人。拥挤不堪的首都参观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千余年前祖国劳动人民在敦煌石室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艺术品；也看到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劫夺文物的可耻行为。热情的参观者在意见簿上纷纷表示了自己对祖国文物的爱护与对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无比的愤怒。我没有想到，七八年来我们在沙漠中默默无闻的工作，今天在革命的建设事业中起着积极的推动和鼓舞的作用！

人民日报还特别撰写了一篇《艰苦工作八年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专文，把十几个工作人员共同艰苦的劳动及其成果都一一介绍出来。6月间在展览会结束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再一次隆重地给予我们全所工作同志以奖金和奖状。一张四尺长二尺宽画着敦煌图案并由郭沫若副总理亲笔书写的

奖状，在中国科学院隆重的颁奖大会上颁发给我的时候，幸福与快乐使我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原来准备好要讲的话，这时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现在，党和人民政府已给予我们以最高的荣誉和奖状。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忘我的劳动，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这是我在写给全所职工报告受奖经过的信上说的一句话。

四

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的领导又由西北文化部转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局指示：业务工作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如在短期内与科学院、古建筑修理所及有关研究机构共同做一套长期的保护和修缮计划，分成几个阶段，逐步实施。在研究工作方面，首先要做好科学的全面整理工作，先编通史，然后再根据个别资料进行专题研究。为了实现上述计划，配合研究出版任务，一套完整的摄影器械设备和专职干部要从速配备起来。为了改善临摹工作和摄影工作的条件，改善生活条件，文化部特地批准专款，购置了一架十五千瓦的发电机和一部电影放映机，一辆吉普车，还有摄影器材设备，并调来专职的摄影工作人员。

新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正说明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祖国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视和关怀。这对于长期在戈壁滩的千佛洞艰苦工作的人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回想当我在1942年初来千佛洞时，从县城到千佛洞坐八九小时牛车的情景，回想当年在阴暗的洞窟深处一手拿灯、一手拿笔做临摹工作的艰苦的岁月，再对比一下今天只要坐半小时的吉普车就能从县城回到千佛洞，在几百盏电灯照耀如同白昼的洞窟里，进行临摹工作，这是我们幻想了多少年的事呀！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实现了。

正式发电那天，1954年10月25日晚上，这是千佛洞全体职工永远忘记不了的。我在日记上写道：“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外线立杆和内部电灯的装置，发电机在千佛洞正式发电放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为了赶工，美术工作同志们自愿在新安装好电灯的洞窟中作夜间的加班。提前吃了晚饭，大家都在新装好的电灯下守候着，等待发光。规定下午六时发电，时间到了，电机发动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三危山与鸣沙山的山谷间响起了轰轰的机器声。接着，所有的电灯，一下子同时放出了晶亮的光辉。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激动得坐立不安，最后还是走进一个壁画灿烂、照耀如同白昼的洞窟中。一个在高架上临摹的女同志，手中拿了画笔，正在呆呆地望着微微有点闪烁的日光灯管，我看到

她那双因为长期在暗黑的洞窟中工作而损坏了的眼睛，这时被强烈的电灯光所照耀，张不开眼睛似地眼皮在闪动。好吗，这个电灯？我情不自禁地向她打问。久久没有听到她的回答。只是在她微笑的脸上，挂了两行泪珠，这是快乐和感激的泪珠，对！这是快乐和感激的泪珠，是回想解放前在黑暗的洞窟中长期临摹壁画时的苦难而感到幸福的泪珠！这个景象，使人回想到四五年前，敦煌解放头几天在城内所看到的英雄的解放军整队前进的行列。在土墙上用土红书写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的标语，勇往直前的队伍，好像冲破黑暗的火光一般，他们给予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以光和热，快乐和幸福。”

五

这个修建于公元 366 年的莫高窟，自明代以后，就很少有人说到它，直到 1900 年五月间发现了现编 17 号窟所谓“石室藏经”后，由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劫夺文物，莫高窟之名重新又宣扬于世。当时由于满清政府的愚昧无知，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以至大量唐代卷轴画、织绣、版画、拓本、佛经、文书、诗词、唐代俗讲、账簿、医卜、历书、户籍等各种用西藏、西夏、回鹘、印度、结卢、康居、古和阗、龟兹等各种文字书写或刻印的文书，大部分已为英法帝国主义分子劫夺去了！这是民族文化遗产受到的一次重大的损失。自 1900 年藏经发现后的三四十年中，怀着捞一把的思想来盗窃文物的帝国主义分子不下有十数次，宣扬他们所盗窃到的赃物，但对他们没有盗窃到手的如许宝贵的壁画彩塑和唐、宋木构建筑等，则一概不提，即使提到了也很简单。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迫于群众舆论所指责，勉强设置了有名无实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也没有做出什么工作。真正对于敦煌艺术的发扬和介绍，可以说是从解放以后开始的。有计划的规模巨大的敦煌艺术向国内外巡回展出，还是最近十年来的事。十年来在国内方面展出的地方有北京、天津、西安、兰州、酒泉、玉门油矿、敦煌县等七个城市，共计参观群众达 99 万人次。国外方面，在中国文化部和对外联络委员会的主持下，分别在印度、缅甸、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日本等六个国家的十二个城市展出。参展的摹本约计九百余件，还包括 285 窟整窟的模型一个。参观人数共计 242600 人次。通过一千余件摹本，国内外接近二十个城市的展出，一百余万人的参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内，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敦煌艺术的热爱，唐代壁画上的飞天，几乎已成为新中国人民快乐幸福生活的象征；在国外，由于敦煌艺术的展出，使我们邻近友好国家的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伟大的中国艺术传统和由来已久的中国与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和平合作的